

目 录

浙江代表团奔赴延安参加“七大”

记略……………刘 先(1)

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第一次

反顽自卫战斗的胜利……………张任伟(9)

回忆金萧支队的战斗历程……………钟发宗(17)

重回四明山……………刘发清(50)

浙南地区人民百折不挠红旗不倒……………黄先河(71)

天台在抗战前的十年地下斗争

……………袁佐文朱崇奎(89)

抗日战争时期浙西武装斗争的

回忆……………郎玉麟(108)

从“两条半枪闹革命”到

闽浙赣皖边根据地……………余龙贵(146)

台湾少年团在浙江……………夏 云(173)

怀念朱镜我烈士	江 闻道(192)
跟随张麒麟 同志 战斗的日子	陈成昌(197)
关于陈小平同志	马 青(205)
三百坛绍兴老酒	白 岩(208)
来信更正	(211)

浙江代表团奔赴延安参加“七大”记略

刘 先

我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矾山区埔坪拱桥村。

一九三五年，由粟裕、刘英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奔赴浙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挺进师来到我们家乡，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打倒地主恶霸，进行土地革命。这给穷人指明了出路。第二年，我就参加了红军，在挺进师首长的关怀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在战斗的考验中成长起来。一九三八年，红军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我留在浙南工作。

一九三九年七月，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在平阳召开了。这个会议先在冠尖举行，后转移到马头岗继续举行。这次党代会办了三件事：一，刘英同志代表省委作报告；二，选举产生省委委员，建立浙江省党的领导机关；三，选举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七大”代表是刘英、龙跃、林一心、郑丹甫、张其林、杨思一、林辉山、孙绍奎（孙平）、丁魁梅（女）、刘法羨（即本文作者刘先）十位同志。由于丁怀孕，省委决定由谢廷斋同志参加七大。九月，我们在刘英同志的率领下，从浙南出发奔赴延安参加会议。

当我们到达安徽茂林新四军军部时，接到中央电示：为预防形势发生突变，决定刘英、郑丹甫、张其林、杨思一同志回浙江

加强领导工作（龙跃、丁魁梅同志原留驻浙江，没有去）。刘英同志当即提名，由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同志为浙江省代表组长。根据中央指示，由广东、福建、浙江、江西、上海四省一市组成一个代表团。为了保密，对外称“服务团”，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同志任代表团团长。我们的具体任务是：保证胜利到达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努力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好“七大”会议，把“七大”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回来。

我们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旬到达安徽省茂林新四军军部的，在那里休息半个月。我们听到了项英副军长给我们做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陈毅支队长给我们作了军事报告。这时，新四军一支队在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继繁昌战役胜利之后，不断打胜仗，确是形势大好。经过半个月的学习和训练，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离开新四军军部，步行北上，直奔革命圣地延安去见党中央、毛主席。

临走时，军部派部队护送，经两天两夜急行军，通过友军区域，到达日本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长江的南岸，我们一面作好战斗准备，一面就下船横渡长江。长江宽阔，浩浩荡荡，船头浪花纷飞，江上烟雾迷茫。江北平原，驻扎着友军，但江中有敌军巡逻艇来往频繁，企图阻止长江南北我军的联系。我们根据敌人行动的规律，选择拂晓渡江。部队由团长统一指挥，留一半在后面打掩护，以防止遭到从后面来的突然袭击，前一半先渡江，上北岸后，分三路放哨，埋伏江北两侧，以掩护后一半过江。这样我们终于全部胜利地渡过了敌人封锁的“天险长江”。

一九四〇年二月初，我们到了江北的新四军二支队部，在那里休息了两天。高大魁梧、英勇善战的罗炳辉支队长，给我们作

了新四军的辉煌胜利战果和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报告。

我们要继续前进时，恰巧支队部机关，要从路东向路西转移。罗支队长便亲自带了一个团与支队部机关同志跨越京汉路，护送我们。我们代表团一行五十多人，跟着他们一起出发。当我们到达铁路边时，铁路两旁敌军发觉了我们，从碉堡里用机枪扫射封锁路面。这是个漆黑的夜，敌人机枪打出的子弹，好象放出金光闪闪的烟火，一道道穿过我们的身边。而罗炳辉同志却安如泰山，指挥若定，只见他站在铁路旁，当我们服务团到跟前时，他很有风趣地招呼我们：“服务团快跟上！快跟上！敌人用机枪在夹道欢迎我们哩！”越过铁路后，到达江苏平原，直奔山东省。

我们到华北之时，还是一九四〇年秋。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显示的威力，震动了敌寇，他们组织全部兵力来进攻我们八路军，华北敌总司令冈村宁次新上任，经常组织十万人左右兵力进行反复“扫荡”，每次“扫荡”连续三个月或四个月，所到村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而此时又遇到华北地区前所未有的大灾荒，我军民常食树叶和草根。局势是极其严重的。但我们军民在党中央领导和指挥下，进行了反扫荡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我们代表团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在各战区军政领导关怀下，在老八路主力护送下，穿过敌人严密控制的封锁线与包围圈继续北上的。四〇年秋天，我们在平原遭受敌人追击，取道太行山北上，他们又追上太行山。太行山海拔在千尺以上，雪花纷飞，寒风刺骨，山上很少有树，敌人飞机扫射，都无处隐蔽，山上几十里不见人烟，更无粮食，不能久住。但是羊肠小路，坡陡难行，敌人的摩托部队也不能上。这有利于我们，不利

于敌人。我们从拂晓前上山，爬上半天，到达山顶的一个庙中，只见云层都在山下了，山上却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大家感到十分愉快，只是肚子饿得咯咯叫。在庙后，喝了几碗清凉的泉水，权当午餐。

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之后，开始下山，往下一看，头昏眼花，两腿直打哆嗦。伴随着快落山的阳光，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向晋西北区前进。我们到达半山腰时，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左侧有两栋小草房，住着的群众很好，看到我们老八路来了，以礼相待，煮豆面给我们吃。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第一顿豆面。

真是冲不完的封锁线啊！过了太行山，还得通过同蒲铁路，才能到延安。这条铁路是当时去延安的必经之路，敌人企图切断华北与延安的联系，特别加强了防范措施。在我们要通过的那段铁路两旁，挖了二米深、二米多宽的道沟，放进水，人马都不能通行。还派了伪军把守，每隔几里地，设有碉堡，加强巡逻。我们第一次设法通过铁路，是带着跳板，想架桥而过，但架桥时被敌人发觉，敌人拿机枪扫射，我们被迫撤退；第二天，护送我们的八路军增加了兵力，另选去路，终于强行通过了。在这两次通过铁路的战斗中，我们几个人受伤，两个老战士还不幸牺牲了。我们对日本侵略者恨极了！在自己国土上行走，都要受他们的袭击，这口气怎么忍得下去！

通过了同蒲铁路后，便安全地渡过黄河。黄河是我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我第一次见黄河，胸头热血竟跟河水一般地澎湃起来。我们过了黄河，就很快到达绥德。从这里可直奔延安了。我们是选择了从晋西北和甘肃下游接壤处通

过的，这里距离敌人封锁口较远，然而这段河水湍急，恶浪翻腾，发出阵阵怒吼，如鬼哭狼嚎。渡船受冲击左右摇荡，上下颠簸，十分危险。但两位四十多岁的老航手，对我们亲如兄弟。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老八路，关心我们的安全，上船前告诉我们：“此地水急，船会摇摆，同志们要坐稳，不可乱动”。由于这两位师傅熟练的驾船技术，使我们的船破浪前进，安然地到达北岸，进入了延安境内。我们看到，一河之隔，两个天地，顿觉宇宙豁然明朗，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奔赴延安的行军历程，无异是一堂活的马列主义政治、军事教育课。我们除了在新四军军部听到项英副军长、陈毅支队长的报告之外，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当我们到达安徽省定远县大桥镇附近一个小村庄时，一九四〇年三月间当我们在盱眙县洪泽湖边的小村庄时，曾两次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敬爱的刘少奇同志报告。我们在华北，又听到无产阶级军事家彭德怀副总司令、常胜将军刘伯承同志给我们所作的报告。他们从政治、军事形势，一直谈到当时当地我党我军的任务和斗争的前景，内容非常广泛而丰富，使我深刻地具体地学习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

在去延安的路上，从华东到华北，各根据地农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们的实际行动，对我教育很大，使我认识到农民是我们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便没有敌后根据地。他们热爱和信任人民军队，军民团结，亲密无间。他们懂得：只有壮大自己的军队，才能打倒敌军。敌人虽然惨无人道，用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但人民群众不因此而悲观失望，却更加坚定地配合部队作战，终于取得民族解放战争一次又一次的伟大

胜利。

我们代表团所经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老百姓的门板睡觉，第二天及时送还并把它上好；每到一地，虽然行军很累，也坚持为群众打扫卫生，为群众劈柴、挑水。我们同群众促膝谈心，访贫问苦，深受群众的欢迎与赞扬。

我们代表团，内部也团结友爱，胜似亲人。我们的党小组长林一心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处以身作则。他人瘦小，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夜里行军十分困难。他常拿着一根棍子，拄着走路，但从不掉队。他肺部有病，身体虚弱，但从不接受旁人的照顾，还常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坚持走路。他脚上起泡了，就用缝衣针烧红刺破，让黄水流出来，第二天坚持行军。

途经山东时，我不幸得了伤寒病，发着高烧，病得连头发也一把一把地掉了。林辉山同志代替了我班长的职务，还经常热情地照顾着我这个病号。团部特意向当地群众雇来毛驴子让我骑。当我们到达鲁中时，遇到了从延安前来这里检查工作的徐向前司令员，他一听到代表团里有个小鬼患了伤寒病，特地派来一个医务人员看望我。这个女同志非常关心战士的健康，他瞧我病得严重，拿出当时最珍贵的“盘尼西林”针剂给我注射，一连打了六针，使我的高烧逐渐减退了。

每到一地，同志们总先找个地方安置我休息，给我喝开水，女同志还帮助我洗衣服，缝缝补补。

谢廷斋同志绰号叫小钢炮，一路上他帮助大队部做了很多工作，大家给他起了三个光荣称号：一是“经济部长”，他帮助大队部管经济，记账，管理账目；二是“秘书”，听首长报告，他

作记录员，向小组同志传达，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学习，三是“副官”，经常打前站，在路上与有关方面联系，工作很积极负责，得到大家称赞。这位同志很注意照顾大局、照顾团结。我们班上孙绍奎同志，温州人，是个年轻老练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是近视眼，在严重的战斗任务中，夜间行军有极大困难，但他很有毅力，坚持行军到底，夜间行军常常带“木马”（木棒）跟着大家跑，从不骑马，一路上也没有掉队，夜间虽常摔跌，但爬起来就跟着跑。这样，坚持一年急行军万余里！

我们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离开平阳的冠尖、马头岗的，行经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七省，历时十五个月，徒步行程一万余里，渡过了严密封锁的长江，跨过了波涛滚滚的黄河，越过了崎岖的太行、吕梁，闯过了敌人道道封锁线，经受了种种考验，终于在一九四〇年底胜利到达了陕北，到了中央、毛主席身边。

当我们来到了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看到了宝塔山、杨家岭的时候，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无比的亲切。进城那一天，天气晴朗，红日高照，我们受到中央党校一部同志的热烈欢迎。

当时，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生活极端困难。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我们坚决响应党提出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审干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向党中央汇报浙江省各方面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党的“七大”在延安礼堂胜利召开了。这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会上，我们听取了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

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决定了党的路线和方针，通过了新的党章，选出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毛主席说：我们开了一个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后，我们和各省代表一样，要赶回本地传达贯彻“七大”会议精神。但当我们到了晋西北八路军总部时，接到中央电示，要我们代表团向北转移，去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东北战略要地，“七大”会议精神由华东局统一布置传达。于是，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参加那里的战斗。我就在东北一直工作到现在。

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 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斗的胜利

张任伟

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份，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蒋介石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正在这时，日寇乘机发动了对浙、闽沿海的进犯。在浙东，四月十七日，由杭州出发的一路日寇，占领了绍兴；另一路日寇，十九日由镇海登陆，占领宁波，二十三日即占领了余姚。当时驻在浙东前线的国民党军队，绍兴有八十六军，上虞有新三十师，宁波有防守司令部，镇海有要塞司令部，并有九十四师、三十四师分驻在镇海、奉化一线，加上警察总队、地方部队等，约有数万之众。但他们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战，往往未见敌寇踪影，就闻风而逃，溃不成军。沿途对人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浙东杭甬铁路以北、杭州湾以南的广阔富饶的平原，全部拱手让给了日寇。

早在日寇进犯浙、闽之前的两个月，党中央、毛主席在关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就指示华中局加强对浙东、闽浙赣边地方党的领导，准备于条件成熟时，向这些地区发展、创立游击根据地。浙东沦陷后，党中央、毛主席又根据浙、闽沿海的新形势，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的游击战争，准备成

立一个战略单位。华中局为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决定将浙东、浙西党的工作，暂时划归苏南区党委就近领导，并派谭启龙同志秘密进入上海，了解浙东的情况。谭启龙同志到达上海后，即得悉浙江地下党在皖南事变后，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破坏，失掉了联系。谭启龙同志返回苏南，向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同志汇报了上海之行所得的情况。苏南区党委立即指示浦东特委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发展。不久，谭启龙同志又秘密进入上海，和顾德欢、吕炳奎、朱人俊等同志，研究如何组织活动在浦东的抗日游击队挺进浙东的问题。由于当时没有能够和浙东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对浙东各方面的情况均不了解，考虑到如公开打着新四军的番号开进浙东，恐站不住脚，必须采取“灰色荫蔽，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通过关系，从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那里，争取了一个“三战区淞沪游击司令部”的合法番号，先由姜文光、朱人侠两同志率少数部队由浦东渡海，进入浙东的三北（当时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地区，侦察情况。不久，由林友璋、蔡群帆、姚镜仁、潘林儒、朱人俊、方晓等同志率领部队，先后分五批渡海入浙东。当时部队活动于新浦沿东、西一带，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了解情况，取得地方党的联系，作为向南发展的前哨阵地。一九四二年五月，谭启龙同志和连柏生同志又从浦东率一百多人渡海进入浙东，并与坚持在浙东地下斗争的宁绍特委书记王文祥同志正式接上关系（一九四一年蔡群帆、林友璋同志和余姚县委张光同志取得横的联系）。七月，华中局从苏中调何克希、刘亨云、张文碧同志带一批军政干部至浙东，和谭启龙同志汇合。为了加强对浙东敌后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即在三北地区的宓家埭成立了中共浙东区党委，谭

启龙同志任书记，何克希、杨思一等同志为委员，并成立了司令部。为了继续采取“灰色荫蔽”，仍叫“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有时也叫“淞沪三北游击指挥部”。何克希同志任司令员，化名何静，谭启龙同志任政治委员，对外称为胡秘书，连柏生同志为副司令，刘亨云同志任参谋长，张文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将浦东过来的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

（一）以南进会稽山的林友璋（林达）、蔡群帆（蔡正谊）部，改编为第三支队（也叫达谊部队），林友璋同志任支队长，蔡群帆同志为教官。

（二）以原苏鲁战区第三纵队朱人俊同志的部队，改编为第四支队，吴建功同志任支队长，张季纶同志任副支队长。

（三）以淞沪游击指挥部的第五支队为五支队，连柏生同志任支队长，张席珍同志为参谋长。

另外编了一个特务大队，大队长周振庭；一个新国民兵团，实际上也是一个大队，大队长周迪道；一个海防中队，中队长盛坤；一个特务中队，中队长周萍，指导员何亦达。

八月，日寇对浦东的“扫荡”告一段落，我们即派朱亚民等十二个同志回浦东坚持斗争。

为了开展政权工作，将原各部队的后方办事处，统一改由三北总办事处领导，王仲良同志任主任，金如山同志任副主任，转为地方政权机构。

三北平原，人烟稠密，经济富庶。慈北盛产棉花；庵东盐场当时是我国的三大盐场之一。交通方面，杭甬铁路，横贯其间，从萧山南下，连接浙赣铁路。因此，三北地区势必成为敌、伪、顽、我所必争。但三北地形狭小，北临杭州湾，敌人便于对我进

扰，我则难于回旋。而姚江以南的四明山区，峰峦重叠，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是余姚、慈溪、鄞县、奉化、新昌、嵊县、上虞七县的交界，南连天台、西通会稽，便于我活动，发动群众，适合建立领导浙东抗战的中心根据地。因此，在宓家埭召开的第一次区党委会议上，作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决策，由何司令、谭政委、张主任率四支队、教导队等挺进四明，刘参谋长率五支队、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等坚持三北。

区党委和司令部成立后，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军先后在油山渡、杨葛殿、竹山岙等地，狠狠地打击了出扰的日寇和伪军，在浙东广大人民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建立起威信，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些有民族意识的中、上层爱国人士，也热情支持和拥护我们，初步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的形势发展中，我军的政治面目也逐渐难于荫蔽，这就引起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注目。他们企图在我军立脚未稳之际，将我军消灭于三北地区。一九四二年十月，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在天台成立了一个“前进绥靖指挥部”，统一整编和指挥残留在浙东地区的国民党武装，又授命活动在乍浦、平湖一带的忠义救国军，由艾庆璋统一指挥，渡过杭州湾，在余姚的段头湾登陆，向姚北挺进，当时进入三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计有：袁启东、孙运达的苏鲁战区挺进十二支队魏显庭部二百余人及海上游击支队王阿弟部二百余人，进至新浦沿、胜山、道路头一带；忠义救国军艾庆璋的第一支队六百余人进至坎墩、河角一带；艾庆璋本人率第二大队及抗卫总队张立民部三百余人，与活动在临山一带的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李文俊部四百余人，陆安石残部一百余人会合；在横河一带尚有淞沪游击指

挥部顾小汀部二百余人。如此，当时伸入我三北中心区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约有一千九百人左右。在四明山与我接壤的国民党军队，姚南有余姚国民兵团第二支队肖文德部及侦察队、独立分队等三百余人，活动在梁弄、横坎头一带；慈溪有特务大队、警察大队、“奋勇”队等三百余人，活动在车厩、芝林一带；鄞西有鄞奉游击指挥俞济民部的第三支队郭青白部三百余人，活动于鄞奉交界处；上虞有八十八团田岫山、八十九团张俊升等二千余人，活动于章家埠、丁宅街一带，这样，在我四明山外围国民党军队总数约有四千之众，对我三北、四明两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大大包围。他们还勾结余姚、慈溪的日寇、伪军，封锁姚江，企图分隔、围歼我军于三北、四明地区。

当时我军在三北地区仅一个第五支队和特务大队及新国民兵团（实际上都只有一个中队的兵力）。自忠义救国军等部侵入我道路头一带后，我五支队被迫退出三北平原，转移至游源山区一带活动。第四支队、教导队已随司令部机关进入四明山。另一个支队（南进支队）已去会稽地区，发动会稽和金萧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当时我军虽号称三个支队，实际上每个支队仅三至四个连，每个连队仅六、七十人到八、九十人，包括机关在内全部人数约一千人左右，与敌人约六与一之比；而且国民党军队还与驻在余姚、慈溪、庵东等地的日寇、伪军相勾结。当时我军力量薄弱，兵力分散，装备简陋，虽然开辟了四明、三北两块根据地，但还没有巩固，群众也没有完全发动起来。特别是进军四明山，仅只有一、二个月的时间，我军完全处于劣势的地位，形势十分严重，内战已不可避免。何司令、谭政委仍从团结抗战出发，一再向国民党当局和忠义救国军艾庆璋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以民族

利益为重，枪口对外，消弭内战，共同抗日，不要再重演“同室操戈”的悲剧；同时，令三北总办事处派员携带慰问品，向伸入我三北中心区道路头的顽抗卫总队张立民部进行慰问，争取他们和我们团结协作，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可是，不自量力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此举，认为软弱可欺，竟谩骂侮辱我前去慰问的人员，袭击我道路头办事处，将我贮存在道路头的棉军衣等物资，抢劫一空。顽忠义救国军的这种无理蛮横的行动，激起了三北地区广大人民和我军指战员的无比义愤，纷纷向区党委和谭、何、刘、张首长表示，要求对顽进行自卫反击，保卫三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正当三北、四明地区国民党军队节节向我进逼之际，会稽地区的顽“奋勇”部队亦向我南进支队发起进攻。由于南进支队到会稽地区时间不久，人地生疏，江夏一仗，反胜为败，在游渡山庄战斗又遭失利，为了避免因兵力过于分散而有被顽方各个击破的可能，区党委决定将南进支队撤回四明，集中兵力，首先解决姚北的艾庆璋部。

面对强敌，我们作了深入的分析：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军进攻的军队虽多，但派系复杂，互相倾轧。有艾庆璋的忠义救国军，属军统戴笠系；有薛天白的淞沪游击指挥部，属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还有属于专区的、县的部队，相互之间，矛盾很多，很难统一指挥。加上打内战，丧失民心，便于我们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如淞沪游击指挥部的顾小汀、苏鲁战区挺进十二支队魏显庭，经我派员向他们晓以抗日大义，表示愿意保持中立。虽然这个中立并不可靠，明知他们是坐山观虎斗，企图坐收渔翁之利，但这说明顽军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很好

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并且打好第一仗，我们还是有可能化劣势为优势的。而且那时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顽八十八团田岫山与浙保发生内哄，田部在天台几乎全部被歼，后突围至上虞地区，又跑到慈溪的三七市投降日寇，致使宁波、慈溪、余姚的日寇，集中力量，整顿田部，这就减少了日寇、伪军对我军的部分压力，有利于我与顽方忠义救国军艾庆璋的决战。

何司令、谭政委、张主任当时反复研究，分析了上述种种情况后，决定利用这些矛盾和有利时机，除了留教导队坚持四明山，牵制四明地区周围的顽军之外，亲率第四支队、南进支队、特务中队去姚北。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渡过姚江，在上林湖和刘参谋长及第三支队会合，同时，令余姚县委举办的党训班解散，要张光同志亲自带领党训班中部分姚北的同志，立即返回姚北，侦察情况，准备向导及财、粮等工作。二十四日傍晚，我军全部挺进至胜山。艾庆璋得悉我集中兵力向北挺进后，遂集中兵力于庵东以西一带，企图挟其优势，围歼我军于姚北。二十八日晚，我军挺进至周家路，刚宿好营，顽张立民部一个排，亦至周家路，被我发现，当双方人员相遇时，我方故意说是“自己人”，将这排顽军诱入村内，一枪未发，予以全部缴械。这一意外收获，使我获悉张立民部的全部情况及口令等。二十九日拂晓，我军向驻在登州街的张立民部发起进攻，战斗未及半小时，除张立民本人率少数人逃走外，全歼该部二百余人，缴获重机枪二挺，轻机枪五挺，步枪百余枝，夺回了被劫去的棉军衣等物资。在俘虏中，晓以抗日大义后，有一百余人，当场自愿参加我军（这里有一客观因素，是张立民部大都系浦东人，我军当时绝大多数亦